

香港經濟強勁增長 五年規劃引領新程

【本報訊】特區政府昨日發表《2026年半年經濟報告》，香港上半年實質GDP按年增長5.1%，是近五年來最強勁的半年度表現，更連帶上調全年實質GDP增長預測至3.5%至4.5%。一個又一個實實在在的數據，說明香港經濟的堅強韌性和迅猛增速，也一次又一次打臉那些對香港的無理「唱衰」。這份上半年經濟成績單清楚證明東方之珠風采依然，而站在「十五五」和特區首份五年規劃開局之年的新起點，香港亦將繼續發揮其獨特優勢，在新時代邁向由治及興。

5.1%的實質GDP增長，雖然看來只是個毫不起眼的數字。但在全球經濟疲弱、香港作為小型開放經濟體面對各種內外挑戰的當下，取得這樣的成績殊為不易。5.1%的背後是特區政府一系列務實有為政策取得的回報，反映的是社會各界積極求變，適應新發展階段取得的成果。這樣的成績對香港而言是莫大的鼓舞，也能讓我們進一步錨定自身發展的方向。事實上，這份

半年經濟報告中不少數據都釋放出一些重要信息，值得各界留意。

首先是堅實數據打破惡意「唱衰」。香港今年上半年上的經濟增長，遠高於過去十年季度平均約2.8%的水平，亦已連續六個季度高於該水平，就算跟全球主要經濟體相比，這樣的表現也絕對稱得上亮眼。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上月公布的《世界經濟展望更新》，預計發達經濟體2026年整體增速僅約1.7%，其中美國全年預估約2.3%，歐元區則更低。但香港作為一個高度開放的小型經濟體，在沒有大規模製造業基礎的情況下，仍能跑贏全球大市，還上調全年預測，充分說明經濟結構的韌性和對前景的樂觀期望。

過去一段時間，一些評論員總愛說香港「玩完」，更搬出一堆似是而非的理由作為「證據」。但特區政府發布的最新數據，以鐵錚錚的事實打臉這些論調，香港從不需要在經濟表現上虛張聲勢，因為數據不會說謊，香港的實際表現，足以證明我們依然能在全球競爭中站穩腳跟，甚至

先拔頭籌。

其次是外貿新趨勢凸顯「內聯外通」獨特優勢。本輪經濟升幅的最大亮點，是人工智能相關產品需求所帶動的外貿增長。當前，內地約三分之一人工智能相關產品經香港出口，而香港本身長期是處理內地半導體的中轉站，今年頭5個月，經香港轉口至內地的晶片總值達1240億美元，佔全國同期晶片進口總額約52%，創歷史新高，比十年前約三分之一的佔比顯著上升。

該現象的表面，反映內地已是先進電子產品的主要來源地與生產基地，也是重要消費與再出口市場，而香港則憑藉自由港、高效清關、完善航空貨運網絡與金融服務等優勢，成為連接內地與全球市場的橋樑。但更深層次來看，其真正說明「背靠祖國、聯通國際」是同一枚硬幣的正反面。部分人總喜歡把香港與內地經貿越趨緊密形容成「依賴風險」，彷彿只有遠離內地才能保持香港的國際地位。但如今證明事實恰恰相反，正是因為背靠內地龐

大的生產市場和創新能力，香港才能在全球人工智能硬件需求爆發時，迅速承接轉運與增值服務，把內地產品高效送達全球市場。

這對香港首份五年規劃也是一個啟示。創新產業或人工智能相關產品的研發、貿易，必然是規劃的重點內容，其考驗香港如何進一步深化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產業協同，進一步探索香港在人工智能、先進電子、生物醫藥、綠色科技等領域的角色。這既是香港連接國家戰略的重點方向，也是香港如何在全球科技與貿易變局中保持競爭力的關鍵。

三是消費模式轉變反映轉型需求。報告顯示，本港私人消費開支在第二季按年實質上升2.8%，連續第五個季度擴張，上半年整體零售銷售貨值按年增長9.6%，而網上零售銷售貨值增長高達27.7%，其中6月網上零售佔總零售銷售約9.4%，增幅達11.6%。這反映市民消費模式正加速向數碼化、線上線下融合轉變。

消費模式的變化，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傳統零售必須加快數碼轉型，提升線上渠道與實體體驗的協同，也意味物流、支付、數據分析等配套服務亦需同步升級。最重要的是，社會各界必須清楚意識到香港首份五年規劃與國家「十五五」規劃，正為這種轉型提供難得的戰略窗口，固守舊有模式已然此路不通，唯有繼續積極求變，才能推動整體產業結構向高附加值、高質量方向升級。

這份經濟報告的數字不是終點，香港也不能只滿意於單單半年的好成績。要實現由治及興，香港就必須要有更長遠的規劃、更宏觀的目光、更精準的施政，因此首份五年規劃對香港絕非一份單純的五年政策文件，更關係到為香港面向轉型升級、高質量發展提供戰略動能。

在五年規劃公眾諮詢期內，政府接獲逾16000份意見或建議，社會對香港聚焦對接國家層面的戰略發展已形成高度共識，也能清楚看到，只要香港繼續善用「一國兩制」優勢、緊密聯通內地國際、勇於改革創新，就永遠能在變局中開創新局。

外籍專才「用腳投票」 香港魅力歷久彌新

【本報訊】最新官方數據顯示，2025年香港共批出31278份外籍人士工作簽證，較五年前增加超過一倍。其中金融服務業外籍工作簽證按年增長17%，創2022年以來新高，主要申請者來自日本、韓國及英國等地區。成千上萬的外籍高階白領與金融專才跨海而來，以實際行動「用腳投票」，向世界傳遞了一個清晰的信號：香港的吸引力不僅沒有消退，反而在國安法護航下歷久彌新。

外籍專才的選擇背後，是一個個理性的個人計算。有法籍量化工程師坦言，香港職業機會較多、生活節奏更快，稅務負擔遠低於歐洲，雖然生活成本高，但計及稅務因素後「最終仍更划算」；亦有美籍招聘業人士今年初由紐約返港，底薪雖由15萬美元降至10萬美元，但受惠於香港較低稅率及相對可控的生活開支，實際財務狀況「幾乎更好」。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專業人士用親身經歷表明：香港的吸引力是實實在在的「性價比」。

穩定法治環境成相對優勢

在筆者看來，外籍專才在此時選擇回流香港，主要受四重因素疊加驅動。其一，香港長期維持最高15%的薪俸稅率，且免徵獎金稅、資本利得稅，對於高收入的金融專才而言，稅後收入差距足以左右職業生涯歸屬。其二，2026年首七個月香港IPO集資額達3282億元，按年飆升154%，直接帶動了投資銀行、法律、會計等專業服務的龐大需求，創造了大量高質量就業崗位。其三，特區政府近期大幅擴展基金經理「業績提

成」的免稅範圍，從私募基金擴展至對沖基金等多種類型，在港基金經理的績效收入接近零稅率，相比歐美30%至50%的資本利得稅，吸引力極為顯著。其四，國際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令部分新興金融中心吸引力下降，而香港的社會穩定和法治環境反而成為相對優勢。

這股回流潮已在市場上引發連鎖反應。今年上半年中環甲級寫字樓租金上漲7.3%，為過去15年來最強勁的半年度增長；空置率降至8.8%，為43個月以來最低。傳統豪宅區租金漲幅明顯跑贏大市，主要國際學校候補名單普遍長達一年。從寫字樓到住宅，從學校到社區，外籍專才的回歸正在全方位重塑香港的城市生態。

人才回流固然可喜，但我們亦不能掉以輕心。短期市場回暖不等於長遠競爭力穩固，其他國際金融中心同樣持續推出優惠政策搶奪高端人才。倘若僅依靠稅務優勢與市場周期吸引人才，缺乏配套環境持續優化，這股人才流入或僅僅是階段性現象。香港需要抓緊當下難得的時間窗口，把短期流入轉化為長期人才存量，讓專才願意扎根、家庭願意定居，避免出現「短暫來港工作、難以長期留居」的情況。

筆者認為，這股回流潮不僅是信心的提振，更應促使我們從四個方向將勢頭轉化為長期競爭優勢。

一、將低稅率優勢升級為「稅制品牌」。香港的低稅制長期缺乏系統性國際營銷。建議特區政府製作面向全球高端人才的「稅後收入計算器」，以具體數字直觀展示在香港與其他國際金融中心工作的實際收入差異；同時可考慮在倫敦、紐約、新加坡等城市設立常設「香

港人才招攬站」，並舉辦定期宣講，讓香港的稅制優勢從「圈內人知道」變成「全球人才都清楚」。

二、將市場復甦升級為「生態繁榮」。建議在五年規劃中明確針對人工智能金融應用、數字資產、綠色金融等新興方向設立專項培訓和引進目標；同時利用外籍專才回流契機，主動吸引國際金融機構將區域總部或亞太研發中心設在香港，從「人才來港工作」升級為「機構將核心職能放在香港」。

香港獨特價值毋懼「唱衰」

三、將居住需求轉化為城市規劃機遇。建議在北部都會區等新發展區域預留足夠的國際學校用地和適合外籍家庭居住的社區配套，並設立「國際人才社區」試點，提供從住房、教育到醫療的一站式配套，將外籍專才的居住選擇從「被動集中」轉變為「規劃引導下的多元分布」。

四、將「用腳投票」的故事講給世界聽。建議旅發局和投資推廣署聯合製作多語種「香港人才故事」系列，以短視頻和深度報道形式記錄不同國家、不同行業外籍專才在香港的真實經歷，讓31278份簽證背後的故事成為國際上最有力的香港故事。

從早年的懷疑到今天的回流，香港用自己的韌性和實力證明：真正的國際金融中心，從來不是「唱衰」就能擊倒的。外籍專才「用腳投票」，是對香港未來最真實的背書。筆者深信，這股回流潮只是一個開始，當「一國兩制」的優勢持續釋放，當香港的獨特價值被越來越多的人親身驗證，這座城市的吸引力將歷久彌新、不可阻擋。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FCC和記協「合流」意欲何為？

【本報訊】香港外國記者會（FCC）近日發表一份聲明，在毫無事實根據的情況下，惡意炒作香港記者協會及其成員遭受所謂「網絡和人身騷擾」，並無理指責特區輿論環境。聲明看似中立，實則顛倒是非，充斥着雙重標準與刻意誤導，遭到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的駁斥和譴責。公眾要問的是，長期以來記協和FCC長期以來狼狽為奸，此次再度「合流」，到底意欲何為？

外國記協的聲明儘管字數不長，但可謂處處「挖坑」、句句誤導視聽。

首先，FCC極力美化記協，甚至將其塑造成「新聞自由的捍衛者」，這全然是顛倒黑白。事實上，香港記者協會長期以來立場偏頗、政治色彩濃厚，在重大社會議題上動輒立場先行，假借「工會」與「非營利組織」的光環，大搞政治操弄與對立撕裂。一個長期偏離客觀中立原則、涉嫌縱容或參與違反法治活動的組織，根本不配代表香港廣大客觀公正的新聞從業者，更談不上維護所謂的專業權威。盲目為其背書，只會暴露出FCC真正意圖。

其次，FCC統統譴責所謂「騷擾行為」，刻意避開事件的完整背景與事實因果。法治社會的評判核心是釐清事實真相、維護公義底線，而非無原則地為特定群體貼上「受害者」標籤。香港社會始終尊重並依法保障合法合規的新聞採訪權利，但也絕不容許有人假借「新聞從業者」之名，從事歪曲事實、抹黑執法乃至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FCC無視部分記協成員長期以來將專業身分分工具化、政治化的劣行，反而倒打一耙、

大肆炒作，本質上是在模糊法律邊界，為違法亂港分子打「保護傘」。

再者，FCC動輒援引基本法中關於新聞自由與組建工會的條文，本質上是對法治精神的斷章取義。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或地區的權利與自由是無限度、不受法律約束的。新聞自由絕非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權，更不是從事損害國家安全、破壞社會秩序行為的「護身符」。基本法在保障權利與自由的同時，同樣明確規定了維護國家安全與法治秩序的憲制責任。任何組織或個人，無論打着什麼旗號、冠以何種專業名稱，都必須在法律框架內活動，絕無例外。香港是個法治社會，如果記協遭到「網絡和人身騷擾」，首先就應該報警，或者拿出實質證據，而不是營造虛假的「恐怖氣氛」。

新聞自由的基石是客觀、真實與法治。FCC身為在港外傳媒組織，本應恪守客觀公正的專業原則，尊重香港特區的法治事實與司法獨立。然而，FCC屢屢發布偏頗聲明，無視香港由治及興的大勢與廣大市民對社會安定的渴望，一再搬出「新聞自由」這張擋箭牌來干涉香港事務、抹黑特區政府形象。這種雙重標準的操弄，不僅無法維護新聞專業的尊嚴，反而讓其自身失去了所剩無多的公信力。

FCC此次的聲明，令公眾回想起2019年兩個組織沆瀣一氣、互相勾連的一幕幕，此番表態，引起公眾的高度警惕。正如新聞聯的聲明所指出：「強烈敦促FCC遵守香港法律，立即停止散布失實言論及一切損害國家安全與香港利益的政治操作，否則必將自食其果！」

國際社會日益失序的根源在西方

【本報訊】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秩序日益動盪，突出的標誌就是大國紛紛詬諸武力，聯合國憲章受到踐踏。雖然從根本上講，國際社會本就是無政府狀態，不存在一個最高權威進行約束。但惡化到今天這個程度，則是由於主導這個秩序的西方出現了嚴重的問題。這有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美西方內部。像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及隨後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英國脫歐、極右民粹主義的崛起，尤其以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為標誌。這些黑天鵝、灰犀牛對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產生了嚴重衝擊，造成顛覆性的破壞作用。

第二個層次是對外。首先是阿拉伯之春，西方推翻利比亞政府導致地區權力格局崩潰，引發二戰後歐洲最大規模難民潮並成為英國脫歐的原因之一，還間接導致恐怖主義的壯大。

其次是西方違背當初冷戰結束時對俄羅斯的口頭承諾，執意進行北約東擴，引發俄烏衝突。喬治·華盛頓大學國家安全檔案館解密文件顯示，1990年2月9日美國國務卿貝克會見戈爾巴喬夫時，明確作

出了「北約絕不向東擴張」的保證。英國國家檔案館1991年3月6日的會議紀要顯示，美、英、法、德外交官明確提及曾向蘇聯作過同樣的承諾。後來美國助理國務卿塞茨和西德外交官均確認了這一點。檔案還記錄了時任總統老布什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等的類似立場。儘管如此，西方卻矢口否認，一直東擴到俄羅斯邊境。

再次是特朗普兩個任期對全球發動貿易戰、大量退出聯合國相關國際組織、撕毀一系列協定——包括決定人類命運的《巴黎氣候協定》、人類健康的世界衛生組織，並一再對外發動戰爭，包括正在持續的美伊衝突，更是極其嚴重地破壞了國際秩序和國際法。

「金德爾伯格陷阱」成為現實

以上事件不僅反映了西方的失誤、愚蠢、自私自利，也凸顯了一個事實：金德爾伯格陷阱已成現實。即西方放棄了自己的責任，全球出現巨大權力真空，國際公共產品如和平、穩定的金融體系、自由貿易出現大規模短缺。

最後是歐美無法接納非西方國家和它們的發展。冷戰結束後，西方對轉向自己的俄羅斯不是全力援助而是趁火打劫，試

圖進一步削弱俄羅斯，一勞永逸解決所謂的俄羅斯問題。前蘇東集團的成員國可以加入歐盟和北約，俄羅斯卻被排除在外。就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是困難重重，甚至比中國都要晚12年。試想，一個沒有俄羅斯適當位置的歐洲怎麼可以有秩序與和平穩定？1814年的維也納會議之所以能夠維持歐洲百年和平，就是因為它既沒有羞辱戰敗國法國，也沒有排除新崛起的俄羅斯。冷戰後的俄羅斯既是戰敗方也是大國，更需要合理的安排，但西方卻完全反其道而行之。

如果說俄羅斯是西方冷戰時的生死對手，西方對它有戒備和顧慮尚可有理解之處，但中國成為西方冷戰後的遏制對象，就完全沒有任何道理和國際倫理了。2010年，中國還是美國的反恐盟友，還在協助美國應對金融危機和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美國卻開始以中國為目標進行亞太轉移。自此之後對中國的遏制一路升級：打擊華為、禁售芯片和光刻機、貿易戰、組建AUKUS等多個組織進行圍堵，把中國定性為唯一有意願和有能力挑戰國際秩序（西方）的國家。

發展迅速的中國不是西方國家，如何處理和中國的關係對西方確實是一個新課

題。但西方這種遏制和排斥的做法，自然會導致國際秩序的動盪。正如美國外交家基辛格所多次強調的：如果沒有中美之間的合作，就不可能建立和平的世界秩序。

箇中原因還是在於西方以自己之心度中國之腹。

西方自陷「國強必霸」思維

早在一戰前，高級外交官、後全權代表英國參加《凡爾賽和約》談判的克勞針對德國問題出版了《克勞備忘錄》，明確指出評估一個國家是否構成威脅，依據不是它的意圖，而是它的實力。二戰後，法國國際關係大師雷蒙·阿隆也提出一個類似的觀點：「能力造就意圖。」也是國強必霸的邏輯。這些觀點堪稱西方處理國際關係的底層邏輯。但是真正決定一個國家行為的還是其文明本身。西方文明從希臘羅馬先夭就具有擴張性，也被它崛起後的歷史所證明，這個理論無疑適合西方。但中國歷史上就是愛好和平的國家，用於防守而不是擴張的長城早就成了中國的象徵，特別是中國強大時也從未有過對外殖民和掠奪。

第三個層次則是西方內部歐美之間的

矛盾急劇上升。

歐美大西洋盟友關係是當今國際秩序一個關鍵支柱，但走到今天雙方在戰略利益上已經南轅北轍。特朗普時期對大西洋關係的破壞不是個人行為，本質是國際關係質變的寫照。即使在拜登時期，奉行的也同樣是美國優先的政策。他支持烏克蘭，也是為了同時削弱俄、歐兩大潛在挑戰者，還能使歐洲更加依賴美國。

雙方矛盾遽增的原因，一是雙方沒有共同的敵人。歐洲認為俄羅斯是最迫在眉睫的威脅，希望美國能把更多的資源投入到歐洲。但美國認為亞太已是世界經濟中心，中國是唯一具有替代美國霸主地位的國家，是最大的威脅。它的最高戰略利益就在亞太。

二是雙方世界運行的方式已完全不同。歐盟是基於規則建立起來的，它也不是霸主。現在歐盟希望的是約束美國，捍衛自己在全球的利益；今天的美國則相反，它不希望受任何國際規則約束，而是基於自己的國家利益需要行動。

正是由於西方的原因，才令國際秩序日益失序。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